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当代文坛

历史意识与历史书写——观察近30年文学的一个视角

【作者】王晖

历史、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在文学研究领域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当我们以此视角来考量近30年文学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其中历史与文学的博弈和缠绕其实蕴涵着许多值得我们回味的东西。对于“历史”这样一个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记录,西方诸多历史学家都给予了他们的理解和阐释,由此而成林林总总的历史意识。在我看来,“历史”的本质应当是本原存在性和人类主体精神性的完整耦合,“是时空的进程和人文话语的双重叠加”。(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戈著《人类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而这个“历史”本身又是可以被细分为所谓以政治、经济、军事等大事件和帝王精英为关键词的“大历史”(Hi story)和以民间百姓、日常生活、边缘事件和人物为关键词的“小历史”(hi story)的。从这样的“历史意识”出发,我们就会涉及到文学的“历史叙述”或者说“历史书写”的问题。

2008年,是改革开放和新时期文学30年的周年纪念。如果说对于百年中国文学的前30年只是一种文献印象的话,那么,近30年文学的变迁则是我们身临其境、身历其中的。在当下对于近30年的文学讨论中,对“大历史”和“小历史”观的书写与表达,成为今人反思其成就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思的声音是多样的,其中有一个声音不绝于耳,那就是文学的“今不如昔”论,即新时期文学30年不如现代文学30年。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2006年接受德国媒体《德国之声》采访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2007年在世界汉学大会上又称“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2008年4月24日《文学报》以《当代文学:有大作无大师?》为题,刊登了该报记者傅小平对在上海日前举行的“新时期文学30年学术研讨会”的消息报道。文中说“对第一个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评论界和读者已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对如何评价第三个三十年的中国文学,却并未达成共识。总体而言,贬低的声音更大一些。”

这当然就涉及到一些关键问题,譬如,如何评价近30年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述”或曰“历史书写”是怎样的一种状况?是否需要根据对“大”或“小”的历史叙述来判断中国近百年来文学梯度的高低?这些问题非常复杂而宏大,需要更多的人以更广泛而深入的视角来谈论。我这里仅仅从历史意识及其书写的角度做一个管窥。我并不认为时间对于文学具有最后的决定性的评价意义,况且一些文学史叙述或学者观点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时间段落的划分很难说是文学的自然内在规律使然,而更多的也许是文学之外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诸如“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等。但是我觉得时间之于文学评价有一个最好的作用,那就是间隔效应,即时间的长度往往决定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清晰度。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对近30年文学的清晰完整全面的评价,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长度,当下的我们只能谈谈“身在此山中”的个人的感觉。

我以为,文学家对历史的书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历史进程的把握、反思可以通过记录重大历史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领袖或精英人物的言行来进行,所谓“宏大叙事”是也。也可以以小见大,以民间性世俗化事件甚至毛茸茸的细节来演绎历史。但无论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还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它们对历史的宏大叙事,其实也是必须脚踏实地的,也就是说,它一定要通过对充满生活质感的“小历史”的叙述和描绘,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如果说,历史有大历史和小历史之别,那么,在文学中,这种“大”、“小”历史是浑然一体的。这就好像我们在谈到文学文本时经常所涉及的“大环境”与“小环境”的概念。经典的文本应当是将主要人物生存的具体生活环境即“小环境”(包括其周围的人,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与其发生各种联系的自然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等)与这种环境所折射出来的社会背景、历史趋势即“大环境”的高度统一。至于“大历史”与

收藏文章

打印文章

关闭本页

发表评论

阅读量[103]

评论数[0]

“小历史”之别，除了黄仁宇借用经济学术语特指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之外，法国历史学研究的“年鉴学派”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他们看来，传统史学就是以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为述史核心，而“他们的主要工作和口号，是对传统的政治史为中心的历史学传统进行挑战，用后来人的话来描述，叫做‘从阁楼到地窖’，就是把研究的重心从上层的、中心的、精英的政治史、经济史、大事件、大人物，转到社会生活、环境、经济这些看起来很形而下的、普通的东西。”（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三联书店2005年版）在文学创作领域，作家大可不必作这样的颠覆，还是二者相融的好。

我以为，近30年来，中国当代作家并非如一些学者所描述的那样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书写“大历史”的力量，近百年中国历史的波澜壮阔与精彩纷呈不可能让他们熟视无睹或漠然相向，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其实不仅是有，而且在某些时段还表现得十分强烈。可以说，他们的历史意识及其对历史的艺术表达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即“新时期文学”的初、中期，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大历史”的直接表达。这在小说以及非虚构文学中表现明显，譬如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小说《班主任》和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它们几乎同时成为新时期文学中对“文革”历史进行反思的意识觉醒的先章。在此之后，在散文、诗歌、传记和影视剧等大多数文艺样式中，诸多作家作品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反思，甚至对于近百年中国近现代史的反思成为有目共睹的一时之潮流。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语境的改变，许多作家则主要致力于“小历史”的书写，对于“大历史”的展现就显得更加多元，有时甚至会更加隐晦。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在面对历史发问或者反思。实际上，即使是史诗性的长篇叙事作品，也不可能像传统史学、历史教材或者政治报告那样，叙说一个高度抽象的“大历史”，它必须、也只能“以小见大”。而且，我们首先从文本中目睹的，正是由无数个日常生活细节、事件以及人物所组构的呼之欲出的“小历史”，然后才能从它中间体悟、提升、概括出“大历史”。

90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诸如铁凝、王安忆、贾平凹、余华、刘震云、苏童、方方、刘恒和刘醒龙等人小说的叙事风格几乎都是如此。譬如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表面上看，它写的是一个叫做尹小跳的女人的忏悔录，一个在城市成长并经历了坎坷情感历练的青年女性的日常生活。但实际上，它是“以小见大”的，是以小的艺术的通道连接着大的历史变迁。也就是说，作品在表现尹小跳的心路历程的时候，又通过对尹小帆、唐菲、父母和方兢等人的描写，广泛透视了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正因为是这样，《大浴女》的价值，首先是文学的审美价值，其次社会认识价值和文化阐释价值才得以很好地体现出来。

“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则在舍弃“宏大话语”的同时，用日常生活的图景侧面表达对历史与现实的态度，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池莉就曾表达过这样的写作意图：“因为我们没有经过文艺复兴的历史阶段，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历史阶段。我们小农经济和由此产生的强权独裁政治，导致了我们的大话语，皇帝话语，唯上话语……我们长期以来被词藻华丽空洞无物的文章影响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也自然而然地习惯用这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感情，以及欣赏用这种形式表现感情的作品。”在经历了西方文学语言和自身曾经用过的“宏大话语”之间痛苦的选择之后，“我更加明确了：我首先因为自己的生命需要而写作，同时为中国人的生命存在而写作，我敬畏真实的个体生命存在状态，并希望努力为此写出更加动人的作品。”（赵艳、池莉《敬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池莉访谈录》）

而所谓的“身体写作”却是用标明人性的性与欲来批判非人性的性与欲的压抑。轰动一时的小说《兄弟》的作者余华在该书的后记中明确表白了这样一种理念：“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用貌似写实，其实夸张、荒诞的闹剧手法描述一个小镇上两个兄弟的人生悲剧，以此来表达作家对过去时代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失落的感慨与批判。所以，无论是对“大历史”还是对“小历史”，近30年来的中国作家们的书写实绩都是显而易见的。漠视这些实绩并借此否认近30年文学未能产生大师和大作的批评，以及“今不如昔”的种种判断，都可以说是不甚全面的感性话语。

当然，我这样说的意思，并非认为近30年文学在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方面无可挑剔或已经尽善尽美。其实，对中国当代大多数作家而言，重要的不是是否面对了历史，或者书写了“大历史”或“小历史”，而是如何具有深广度地去形象化地诠释历史，如何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之心去叩问历史、反思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的真相，以思想和艺术的亮度去照亮历史。在这方面，我以为 2007年

底辞世的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或许能够给我们些许教益。这位以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成名的两届普利策奖得主，在对“大历史”的表现和深思上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文风大胆、言辞犀利的梅勒具有强烈的反叛文化意识及叙事观，这种意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二战以后全球东西方阵营的冷战思维。冷战导致对抗，越战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冷战还使得全球在上个世纪60年代处于激变动荡之中，在美国国内则主要是通过社会各阶层对“越战”的反应来表达这种伴随着激荡而来的反叛精神。可贵的是，梅勒的反叛理念源于冷战，但最终却超越了冷战。他在获得1968年普利策非小说奖和美国国家文学奖的《夜幕下的大军》一书中，通过反“越战”的描述，传达出超越国家、民族、党派和地域，超越意识形态界限，关注人类政治文化生态平衡，致力于创造和平世界的文化伦理诉求。这部小说与历史、现实和想像、写实与虚构交织一体的作品，对美国60年代“分崩离析”、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现实所作的尖锐批评、对美国历史所作的深刻反思，使得它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弥足珍贵的。梅勒对美国“大历史”的书写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类关怀的气度，这使得他成为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作家。美国社会文化批评家琼·迪迪恩因此称他为“美国伟大的良心”，另一位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也作过这样的赞誉：“梅勒现在声名显赫，无疑有一天会被遗忘，但也还会再回来，那时候他将成为他的年代道德良知的历史学家，是他那一代作家的代表。”我想，我们当代的中国作家是不是能够从梅勒那里获得某种启示呢？

近30年文学，实际是一个勾连着两个世纪、三个时段（即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的文学板块。这样一个板块所生成的丰富样态，所发生的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对于现实的直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或者令人困惑的问题，甚至来自于自身和身外的危机，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曾有过的。但是我们相信，并且也期待着，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潮起潮涌、古今与中西的撞击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时代，新的足以傲视群雄、开放多元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诞生，进而为中国之崛起这个主旋律提供有力的强音。如果能够如此，那么，以下这样的预言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美]劳伦斯·格罗博《“美国的托尔斯泰”进入万神殿》，《南方周末》2007年11月15日）

【原载】《文艺报》2008-11-29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教研室，19

更多
加盟
信息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法律声明 | 招聘英才 | 欢迎加盟 | 软件下载
永久域名: www.literature.org.cn www.literature.net.cn E-Mail: wenxue@cass.org.cn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